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07

《坠落的人》中的坠落与救赎^①

李震红^{1,2}

(1.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2. 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通过描写“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劫后生活折射美国全民族的创伤;并通过揭示恐怖的根源来提醒人们,人类正处于伦理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人类应积极应对危机、回归善的本性、确立正确的信仰,才能从坠落之地走向自我救赎。

关键词:《坠落的人》;唐·德里罗;坠落;救赎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033-05

On the Fall and the Redemption in *Falling Man*

LI Zhen-hong^{1, 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Don DeLillo's novel *Falling Man* depicts how a victim of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and his family tried hard to live a normal life, which reflects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the whole 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more, b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error, the novel manages to recall people to the crises they are in, i. e. the loss of virtue and faith. Human beings are expected to spare no effort to survive their mental fall and to achieve self-redemption.

Key words: *Falling Man*; Don DeLillo; fall; redemption

在众多刻画“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文学作品中,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的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 以下简称《坠》)脱颖而出、被力捧为“‘9·11’小说定义之作”,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仅因为“9·11”事件在时空上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来说离得太近,使得恰当呈现它异常困难;更是因为这部小说突破了普通意义上的创伤叙事,“将看似混乱的不同人物的记忆碎片记录下来,再加以汇集,呈现出多重叙事声音”^[1],创设了多义性的解读空间。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一方面“通过对痛苦和记忆恢复的描述,寻求对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的理解,从而把它们化作共有的记忆来开始疗伤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渐渐投射到读者身上的认识上的混乱、不安全感以及‘9·11’之后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2][4]};有的研究发现了该小说的“反叙事”特征,认为它“以巧妙的方式,从根本上反击了‘9·11’之后由媒体和布什政府所创设和散布的主导叙事的保守倾向”^{[3][73]},“即放下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包括世贸中心幸存者和劫机犯)以言说和悲悼的权利”^[4]。笔者认为,作为一部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坠》必然要见证历史、表征创伤;然而它更多地关注人类的生存危机,试图唤起读者对人类心理和精神“坠落”的根源及其解救之路的思考。本文尝试从作品的两条叙事线索和三个标题人物出发,从坠落,即“9·11”事件

① 收稿日期:2014-11-1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SK2013016)

作者简介:李震红(1968-),女,江苏淮安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20世纪英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

所导致的创伤及其背后的伦理和信仰危机,与救赎的层面解读该小说的深刻主题。

1 坠落:个体之痛、民族之殇

《坠》的叙事主线描写在世贸塔楼工作的基思(Keith)在“9·11”袭击当日死里逃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分居多时的妻子丽昂(Lianne)的住处,开始了惊魂后的家庭生活。阻碍基思创伤恢复的是在其心中挥之不去的“白色衬衣,一只手朝上,往下坠落”的身影,这也构成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坠落”的意象。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9·11”浩劫中死去的人已然坠落,活着的人“有的正在心理上坠落;其他的人在慢慢死去”^{[5]135}。小说通过这样一种触目惊心的呈现,提醒人们全球恐怖已经威胁到普通民众的身心健康,使人的心理和精神处于“坠落”的边缘。

亲历“9·11”的基思身体渐渐康复,却始终不能从创伤的阴影中自拔,一直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恰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研究显示,创伤患者在醒着的时候不会经常回忆他们所遭遇过的事件,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去想这些事;而在梦中,患者反复地梦见他所遭遇过的事件情境^{[6]10-11}。基思总是回避与妻子谈及袭击事件,然而他的“正常人”的伪装压制不了他通过诉说来排解压力的疗伤期盼。终于,他以归还公文包的名义寻找到袭击当日同在现场的佛罗伦斯(Florence),在共同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与她发生了一段婚外情。“他们相互获得性爱的愉悦,然而这并不是让他回到那里的原因。吸引他的是盘旋而下、没有时间限制的持久飘荡过程中共同了解的东西。”^{[7]147}虽然他觉得应该负责地对待生活,然而他的“强制性重复”的创伤症^①使他一次次重返佛罗伦斯那里,重温当时的一幕幕。他的创伤症还迫使他把远离家人、经常飞往赌场赌博作为生活的常态。他也想回归家庭,然而“在玩牌的时候,他脑海里通常不会无意中闪现出历史,闪现出回忆”^{[7]245},而一回到现实,他就会“以导致幽闭恐怖症的方式重复那些东西:浓烟、重叠的尸体”^{[7]97}。

基思的难以愈合的创伤给欲将其拉回正常生活的丽昂带来了深深的痛。丈夫一度酗酒的行为和疯狂的举止令她难堪、莫名其妙地猛踹房门让她不寒而栗。“9·11”事件的创伤又勾起了她对父亲自杀的旧的创伤的重新体验。她因此更加勤奋地带领有老年痴呆倾向的写作班的老人用写作的方式“诉说”以缓解痛苦。然而,每当她头脑中浮现出丈夫绝望的表情、阅读报上的“9·11”死者简历、观看不断重复的飞机撞楼影像时,她就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当袭击发生时,上帝在什么地方?”^{[7]64}她从怀疑上帝到怀疑母亲的情人是恐怖分子、怀疑楼道放音乐的女人故意制造恐慌,因此深陷疑惑和不安之中。

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一个人自己的创伤与他人的创伤紧密相连”,而“通过倾听他人的伤痛,很可能令你震惊的是,他人的创伤会引起你自己的创伤”^{[8]8}。基思的家人在感受基思的创伤和了解无数受害者的创伤的过程中,自己也经受着伤痛:丈夫经历恐怖后萎靡不振、妻子在孤独和惶恐中度日、本该享受美好童年的儿子拿着望远镜对着天空、等待撞楼飞机再次出现、孩子外婆因在对待恐怖事件的立场上与相伴多年的情人产生分歧郁郁寡欢而病亡。“这就是‘9·11’之后的日子;几年已经过去,成千上万的人仍被梦魇困扰;被困的人、被压的肢体……无助的梦。”^{[7]251}基思一家在“9·11”后的情感离合及创伤经历,如同其他无数亲历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家庭一样,折射出了美国全民族的伤痛:随着世贸双塔坠落的,除了因惊慌和无奈而从塔楼上坠落的人,还有那些亲历和目睹“坠落”的人;随着坚不可摧的帝国大厦的倾覆,超级大国的自尊和骄傲也随之坠落。

2 坠落:人类的相互倾轧

《坠》以基思一家为叙事主线,而其3个章节的标题名却是主人公之外的3个陌生的人名,这引起了读者对这些人名所代表的人物的关注:恐怖头目本·拉登(Bin Laden)、丽昂母亲的情人马丁(Martin)以及化名为“坠落的人”的行为艺术家。如果说本·拉登是“9·11”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而“坠落

① 弗洛伊德研究认为,创伤患者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从以前的这些非但未产生愉快、反而引起不愉快的活动体验中汲取任何教训,而是在某种强迫原则的逼迫下,身不由己地再三重复这些活动。详见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第三章。

的人”则通过行为艺术重现“坠落”情景,那么马丁这个与“坠落”毫无牵连的旁观者也被给与了标题人物的显著地位,似乎令人费解。事实上,德里罗正是通过马丁来引出对恐怖问题的探讨。

在与丽昂母亲妮娜(Nina)讨论恐怖袭击的原因时,欧洲人的身份使马丁得以站在美国人和伊斯兰人之外的立场。他认为这次事件是“一个干涉别国内政、出兵占领别国领土的大国”^{[7]49}自己酿成的恶果。而美国人妮娜对马丁的言论异常愤怒,她认为驱使恐怖分子制造恐怖袭击的原因,完全出自伊斯兰国家对自己落后现状的恐慌,“那些社会崩溃的原因并非在于西方国家的干涉。在于它们自身的历史、它们人民的心态”,“他们自己失败了,却责怪我们”^{[7]50}。在两人针锋相对的观点中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恐慌”是造成一切的根由。不过区别于妮娜认为伊斯兰人“恐慌是因为自己落后于人”的观点,马丁则认为“恐慌”是因为“这个世界罹患疾病”^{[7]49}。那么这种“疾病”究竟指什么呢?

在西方伦理中,从希腊哲学家所共持的“每一个灵魂都以善为目的”^{[9]167}、到基督教的仁爱伦理、直到海德格尔的“善高于存在”^{[9]158},无不推崇友善宽厚的为人处世之道。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早已处于病态的伦理之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思被喧嚣的后现代文化曲解成“我叫喊,故我存在”^{[10]178},人们倾向于不择手段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伦理学命题,也被通过“自由选择”而成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和防范“他者”的依据。这是对人类伦理的践踏,也是造成人们心理恐慌的原因。

这种伦理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观念的“异己”或“他者”之间的相互对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范围的混乱与恐慌,“9·11”事件就是对此最真实、最令人心痛的背书。在《坠》中,马丁对此事件的分析道出了超级大国美国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相互敌视、打击、报复的事实:伊斯兰人只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块安身之地”^{[7]124},却屡屡受到排挤和压制;伊斯兰国家因此形成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视,“反西方”被“反映在穆斯林正统和家庭观念中,已成为抗拒邪恶西方的放纵和消费文化的标志”^[11]。结果正如马丁所说,双子塔楼作为财富和权力的幻象被修建起来,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因此成为了毁灭的幻象^{[7]124}。由于马丁发表了不符合美国主流媒体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言论,伤害了妮娜的感情,更受到丽昂的怀疑:“也许他是恐怖分子,然而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7]213}丽昂的恐慌其实也是美国人以自我为中心、把不同意识形态者视为“他者”而加以防范的心态的反映。此外,妮娜在反驳马丁时对于伊斯兰国家落后状况的高高在上的责难,与其说是美国把实际利益冲突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进行宣传的结果,不如说更体现了人性的堕落——“认为邻人的痛苦是合理的,这必然是一切不道德的源泉”^{[12]163},也是生活在缺失平等与友爱的世界里的人类恐慌的根源。

3 坠落:身不由己的决绝

就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而言,人类的伦理危机也折射出其严重的信仰危机。“爱人如己”是西方基督教提出的一个伦理学命题,而人类对“他者”的排斥显示出这一伦理思想正随着“上帝之死”而遭到摒弃。文明的进步使得中世纪以来以“上帝”为其基本原则和价值的整个西方社会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瓦解^{[13]17},西方人在宗教文化中所形成的信仰的根基也随之动摇,陷入精神的迷惘之中。同样,信仰危机也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疾患。正如英国神学家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在阔别祖国传道近30年后回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失去了盼望”^{[14]10},这种对信仰失去信心的情绪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坠》的第二条叙事线索——虚构的劫机者哈马德(Hammad)的“坠落”,正是人类信仰危机的生动写照。

哈马德并不是坚定的“圣战者”,甚至不清楚为何要劫机撞楼。直到“圣战”前夕,他仍在寻求答案:“是否一个人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件事情?”^{[7]189}他牺牲自己以达成的“某件事情”似乎正是他的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信仰”。他在马里恩斯特拉斯参加导师阿米尔(Amir)的讨论会、和伊斯兰教徒们一起观看“圣战”录像,接受着诸如“西方人心灵和肉体都堕落了,执意要把伊斯兰国家变为供鸟啄食的面包屑”^{[7]185}等言论的熏陶。很显然,他被以宗教信仰的名义而灌输了某种对“异己”的仇

恨。恰巧身材魁梧、行动笨拙的他“一直觉得他的身体里承载着某种无名能量”^{[7]85},因此就决定接受“圣战”培训来释放。

在诺克米斯接受飞行训练时,他自认为理解了伊斯兰教:“顺手捡起一块石头,用手握住它,这就是伊斯兰教”^{[7]186};而他决定参加圣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流血”和“牺牲自己”,因为“死亡比生命更强大”^{[7]186};当他被告知圣战“目标是杀死美国人”、而他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时,他信以为真;当阿米尔彻底脱去了宗教领袖的伪装、整天策划恐怖袭击的时候,哈马德已经浑然不觉,因为他正忙于训练自己完成“最高层次的圣战”^{[7]189};当他担心会伤及无辜时,阿米尔的荒唐回答“除了死亡这个事实之外,那些将要死去的人没有生命的权力”却使他觉得“听起来像是哲学”^{[7]192}。于是他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只死一次,一举成名。”^{[7]192}

哈德逊走廊是他走向“坠落”的最后一站。他在监视舱内执行任务时,身上流血的伤口使他感到疼痛;而令他更加痛苦的是,在此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似乎已经有所觉悟——他想到自己竟然和阿拉伯河战场上的那些什叶派娃娃兵一样,被当作“没有生命权利”的、用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此时的他却已身不由己,只能背诵神圣的文字向这个世界诀别:“在即将到来的几秒钟时间里,你生活中的所有罪孽全都得到宽恕……你一直希望牺牲……这将得以实现。”^{[7]261}这便是他最后的信仰。

至此,哈马德自愿加入恐怖组织、“以身殉教”的原因已彻底明朗:正是对自己的信仰的无知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迷惘,致使他逐步被人利用、最终稀里糊涂地踏上了“坠落”之路。事实上,他所信仰的“圣战”被曲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圣战并非以死亡为其最高境界,而是“一个内在的过程,一种为了接近上帝而在自己内心进行的严苛的精神斗争”^[15]。而任何宗教的上帝都绝不会教导人去通过牺牲自己、伤害别人来达到自己灵魂的升华。恐怖头目和少数极端分子正是利用普通民众的无知,以宗教信仰的名义煽动起他们对需要打击的对象的仇视,致使他们成为政治及其他斗争的牺牲品。盲目信仰的哈马德因而被推上了导致毁灭的飞机,和被撞的塔楼以及塔楼上绝望的人们一同坠落。

4 救赎:浴火重生复乐园

作为一个严肃作家,德里罗坚持认为艺术家应该担当重任,打破当代社会以恐怖、集权政治、消费文化等占据叙事中心的格局。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撰文谴责恐怖分子的恶行、反思事件的后果,并指出目前“世界叙事属于恐怖分子”,而我们的责任则是积极创造“反叙事”^[16];在《坠》这部酝酿多年的小说中,第三个标题人物——“坠落的人”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艺术家不惜牺牲自己、竭力与恐怖叙事抗争的决心。小说中“坠落的人”的直面创伤、悲剧发生前后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爱与扶持、以及在小说结尾处丽昂的重获新生,都似乎在昭示人类从“坠落”走向自我救赎的可能。

“9·11”之后,人们会在纽约市的不同场所偶遇“坠落的人”表演世贸双塔上陷入火海摔下去或被迫跳下去的人的坠落情景。对此,有的人表示愤慨,有的人嘲笑他是“傻瓜”,警察也不止一次将他抓走。人们弄不清他“坠落”的用意何在。他没有关系亲密的人在袭击中丧生,似乎不需要藉此方式哀悼;他的每次表演并未事先通知,似乎无意引起公众注意;他谢绝了在各种知名场所和机构表演和发表演讲的邀请,这似乎也可以排除任何商业目的。那么,他这种表演究竟缘于何种目的?是谴责恐怖分子的暴行,还是想告诉人们生命的脆弱、相互关爱的重要?也许想通过自己直面现实的举动来唤醒无数像基思一样醉生梦死、逃避现实的人?德里罗让“坠落的人”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也许,“他是一位坠落的天使”^{[7]242},如同代替人类受难的耶稣,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他义无反顾地“坠落”,正是出自一种信仰,一种人类定能鼓足勇气、实现自我救赎的信仰。

在小说中,德里罗还调动了很多积极的因素,使读者在体会到人类的伦理和信仰危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芒和人类“复乐园”的希望。在“9·11”灾难发生时,基思首先想到的是朋友鲁姆齐(Rumsey)的安危;人们在逃离灾难现场时相互搀扶、鼓励,保持着人类的尊严:“有的哭喊着,有的被烧伤了,但是,大多数人保持着镇定。有一个妇女坐在轮椅上,他们抬着她,人们让开道路,在楼梯上形成了一个单列”^{[7]59};更有奋不顾身的消防员和塔楼维修员“冲上楼梯,冲入浓烟之中”^{[7]59}。灾难的发生

不仅考验着人性,也呼唤着亲情、友情的回归:十几年没有联系的前妻给前夫打来问候电话、离家多时的丈夫基思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手提包的失而复得使弗洛伦斯多了份活下去的勇气。灾难中仍存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友情,彰显着人伦的复兴、预示着人类浴火重生的希望。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德里罗在塑造基思这个长久沉沦的创伤患者的同时,也赋予其妻子以信仰的力量。丽昂也曾因父亲的自杀、丈夫的萎靡而饱受折磨,然而与丈夫的游戏人生相反,她通过积极地工作、生活以及积极地反省而重获了信仰。正是由于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才使她带着儿子加入到反战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也正是通过在教堂里的沉思,使她找回了自我:“她准备独自生活下去,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下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去。”^{[7]258}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德里罗让丽昂走出创伤阴影,表现出人类在灾难之后走出阴霾、面对新生活的信心。

5 结语

《坠》成功刻画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劫后生活,并在对人类创伤的反思中探讨人类所面临的伦理危机和信仰危机、寻求从坠落之地走向自我救赎之路。小说在叙事中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将不为人知的“沉默的大多数”搬到台前,使作品具有了作者所倡导的“反叙事”的功能,传达了作者净化人类精神家园的艺术家的担当和理想。小说凸显家庭、亲情和友情的意义,似在说明人类只有努力回归其本质的“善”才是摆脱“坠落”的良方;此外,一个人正确而坚定的信仰,也是助其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小说中女主人公因积极的生活态度得以坚定信仰而重生,也预示着美国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必定能从坠落中振作起来,恢复美好家园,完成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 [1] 杨金才.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6-12.
- [2] Bizzini, Silvia Caporale. Grieving and Memory in Don DeLillo's *Falling Man* [C]// Peter Schneck, and Philipp Schweighauser. *Terrorism, Media, and the Ethics of Fictio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on Don DeLillo*.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 [3] Michael, Magali Cornier. Don DeLillo's *Falling Man*: Countering Post-9/11 Narratives of Heroic Masculinity [C]// *Portraying 9/11: Essays on Representations in Comics, Literature, Film and Theatre*. Veronique Bragard, et al.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11.
- [4] 但汉松.“9·11”小说的两种叙事维度[J].当代外国文学,2011(2):66-73.
- [5] Kauffman, Linda S. *Bodies in Rest and Motion in Falling Man* [C]// Don DeLillo; Mao II, *Underworld, Falling Man*. Stacey Olster.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7] 唐·德里罗.坠落的人[M].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8]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6.
- [9] 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 [10]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 [11] Jameson, Fredric. *The Dialectics of Disaster* [J].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02, 101(2): 297-304.
- [12] Levinas, Emmanuel. *Useless Suffering* [C]// *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 Rethinking the Other*. London: Routledge, 1988.
- [13] Sorokin, Pitirim A. *The Crisis of Our Ag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utlook* [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44.
- [14] 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M].赵中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5] Kauffman, Linda S. *The Wake of Terror: Don DeLillo's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Baader - Meinhof" and Falling Man*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8, 54(2): 353-377.
- [16] DeLillo, Don.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J]. *Harper's*, 2001 (December): 33-40.